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塞万提斯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陈众议 编选

塞万提斯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塞万提斯精选集/ (西班牙) 塞万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著: 陈众议编选.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11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柳鸣九主编)

ISBN 7-5329-1780-0

I. 塞… II. ①塞… ②陈… III. 文学-作品集-西班牙-中世纪 IV. I55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4842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8.25 印张 6 插页 647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5.30 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选者序

现代小说之父

我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
自以为具有诗人的才学……

——《帕尔纳索斯之旅》

陈众议

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自以为具有诗人才学的塞万提斯命途多舛，穷困潦倒，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与叹惋。他在作品中经常发出生不逢时的感喟：“灾难多于诗文，失意起于垂成。”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形单影只，苦心谁恤。凡夫俗子的鄙夷自不待言，就连十七世纪西班牙文坛至尊洛佩·德·维加也对他作出了极其尖酸刻薄的评价：“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的诗人，没有比《堂吉珂德》更蠢的作品。”是的，由于种种原因，塞万提斯的才学并不为同时代人所承认。然而，时过境迁，十八世纪的德、英、法、意作家在塞万提斯身上看到了“未来”文学的光华。于是，塞万提斯首先在德、英、法等国受到重视，从歌德到海涅，从拜伦到雨果，德、英、法作家无不定塞翁于一尊。

塞万提斯的名字从此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并且长盛不衰。

塞万提斯全名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于1547年10月9日出生在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他出生时，家族已经破落。他徒有一个贵族姓氏和一腔报国热忱，中学刚毕业就做了“助理医生”，随四处出诊的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弱冠之年充当阿克夸维瓦红衣大主教的侍从，前住意大利。受阿克夸维瓦的影响，塞万提斯阅读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一年以后，他应征入伍，不久即真枪实弹地参加了抗击土耳其军队的勒班托海战。多数文史学家称塞万提斯在那场战争中机智勇敢，表现不俗，直至身负重伤，失去左臂。战争结束后，他奉命随军驻防那不勒斯，两年后获准回国。不料，回国途中遭海盗袭击，被掳至阿尔及尔。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无力支付赎金，塞万提斯历尽磨难，顽强地活了下来。五年后，西班牙政府和教会派人到阿尔及尔引救俘虏，带回了正在服苦役的塞万提斯。

劫后余生的塞万提斯多次上书求职未果，只好重操旧业，写些诗文赞美达官贵人，换取些许财物，聊补无米之炊。

1587年，不知是哪位显贵发了善心，施舍给他一个军需的职位。此后，塞万提斯回到军队，替“无敌舰队”效命。然而，他非但很快丢了饭碗，而且一不小心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罪名是非法征收谷物。获释后又是上书又是托人，亲友的亲友、关系的的关系的关系，全使上了，好不容易混了个税吏做，便处处小心谨慎，未敢有半点疏虞。他每次征得税款必如数存入银行，生怕不慎丢失，岂料阴差阳错，偏偏银行出了问题并最终破产倒闭。塞万提斯因无法赔偿税款而再次身陷

囹圄。出狱后，他四顾茫茫，壮胆上书国王，要求去美洲殖民地服务。在焦急不安地等待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之后，他终于心灰意懒，全心投入文学创作。晚年蜗居在瓦利阿多里德的一个公寓里，楼下是下等酒吧，楼上是末流妓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含辛茹苦，完成了《堂吉珂德》第一部的写作，被传为美谈。《堂吉珂德》在西班牙一问世即引起巨大轰动，但时人并不理解作者的苦心孤诣，当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畅销书”，只可博人一笑。

此后，塞万提斯仍屡遭厄运打击。先因门前有人遇刺而涉嫌入狱，后因女儿陪嫁掀起波澜而出庭受审。与此同时，法院继续责令其偿还“遗失”税款；妻子病故；有人抢先发表《堂吉珂德》续篇……

塞万提斯贫病交加，四面楚歌，但却仍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堂吉珂德》第二部和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

有关研究家认为，塞万提斯时期，骑士小说已经衰落。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正经历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文艺复兴运动蓬蓬勃勃。文坛上各种古典格律诗盛极一时。戏剧，尤其是喜剧也处在上升阶段。做一个诗人或者戏剧家，乃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

塞万提斯的处女作便是一些悼念伊莎贝尔·德·瓦卢瓦王后的谣曲和十四行诗，发表于1569年的《马德里记事》。《马德里记事》由他的老师胡安·洛佩斯·德·奥约斯编选，还辑录了塞万提斯的一首献词。

自此往后，塞万提斯孜孜矻矻，创作了大量题赠、应酬之作和关乎人情世态的即兴诗篇。可惜岁月流逝，他的这些诗作大多散失。当然，十八世纪之后，又陆续有人将一些佚名诗作

归于塞万提斯名下，则未必全都可信。

好在塞万提斯另有一卷长诗《帕尔纳索斯之旅》留传了下来。这卷长诗对同时代诸多诗人竭尽赞美或者贬抑之词，属于“黄金时代”的流行品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好恶。

在从事诗歌写作的同时，塞万提斯创作了不少戏剧，保存下来的有九部喜剧、八种幕间短剧和一部悲剧。喜剧包括《阿尔及尔的交易》、《西班牙美男子》、《争美记》、《阿尔及尔的囚徒》、《改邪归正》、《苏丹王后》、《爱情迷宫》、《错相思》和《鬼点子佩德罗》，其中《阿尔及尔的交易》成文最早，写作者在阿尔及尔的亲身遭遇。其他喜剧可粗分为三类，一类仍以作者在阿尔及尔的经历为题材，另一类反映下层人的生活，再有一类则是根据宗教故事改编而成的。

幕间短剧有《婚事法官》、《流氓嫖夫》、《达甘索地区选村长》、《殷勤的守护神》、《比斯开人》、《奇迹戏》、《萨拉曼卡的山洞》和《吃醋的老汉》，它们全都写乡村市井生活，大都诙谐机警，有的不乏夸张传奇色彩。

悲剧《被围困的努曼西亚》也是塞万提斯的早期作品，写努曼西亚居民拼死抵抗罗马侵略者的故事，颇受歌德、雪莱、叔本华等人的赞赏。

也许是因为他作为诗人和戏剧家的才华并未得到时人的承认，也许是因为他命中注定要成为“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毅然决然地改变方向，创作了牧歌体小说《伽拉苔亚》、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堂吉珂德》和《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

然而，塞万提斯的小说同样不被时人所看重。

二

一如《堂吉珂德》首先在英、法、德等国受到重视，传统塞学的“定音之锤”也是由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法、德等国的读者而非本土的西班牙人敲响的。数百年来，西班牙人对于这一“耻辱”一直耿耿于怀。然而，就像当初不可一世的帝国盛极而衰使“无敌舰队”全军覆没、“黄金时代”转瞬即逝，遂产生了《堂吉珂德》等墙内之树花香墙外的奇特的文化现象，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却又不甘纡尊降贵而从此一直闭关自守的西班牙，又不可避免地使困扰一代又一代西班牙文人的“雪耻”梦想终成泡影。直至十九世纪末，由于殖民地丧失殆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专制统治难以为继，老牌帝国威风一扫无余的西班牙才不得不略开门户，以迎接将临的、未卜的二十世纪；而门户开放的结果之一，便是使塞学得以在本土拓展的近半个世纪（因内战而告终）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如果说罗德里格斯·马林、梅嫩德斯·佩拉约和梅嫩德斯·皮达尔等跨世纪学者于上世纪末借助语文学等近现代语言学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塞学，为塞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那么，到了本世纪，随着更多原始资料、最早版本或手稿的“出土”，西班牙学者向世人展示了一线崭新的地平线，西班牙从此成为当之无愧的塞学中心。于是，天时、地利、人和，西班牙学者质疑问难，对一系列传统见解“施以非礼”。

海涅于1837年撰写的德文版《〈堂吉珂德〉序言》^①无疑是诗人独具慧眼的有力见证，同时也是塞学史上一块高耸着的

^① 见杨绛译《精印〈堂吉珂德〉引言》，《文学研究集刊》卷二。

里程碑。它不愧为十九世纪塞学的经典之作，许多观点在今天仍经得起推敲。然而，受时代、社会、个性等主客观原因的局限，海涅关于塞万提斯的学说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譬如，他断言塞万提斯是“罗马教会的忠诚儿子”^①就有失之偏颇之嫌。

自1925年（《塞万提斯思想》）到1957年（《塞万提斯再探》）以至更晚，西班牙塞学专家阿美利科·卡斯特罗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阐述塞万提斯的“伪善”。他认为塞翁并非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是一个“善于伪装”的、“地地道道的人文主义作家”。阿美利科先生的立论基础是有关文（版）本的比较研究。

在《塞万提斯》一书中，阿美利科对先师罗德里格斯·马林于1901年校勘的训诫小说中的《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的两个不同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比较，发现并断定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该篇创作于1606年前后，1613年收入《训诫小说集》时作了修改。作品写一个爱吃醋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年事已高却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姑娘为妻。为安全起见，他送给她一座形似监狱的住宅做新房，并买下众多女奴早晚看护。婚后，他与她如影随形，终日不离。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当然明白丈夫的意图，于是也便足不出户，检点度日。即便如此，丈夫还是放心不下，他命令下人赶走了家中除他本人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位“男性”：她的宠物，一只雄性小动物。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一个唐璜式的浪

^① 海涅称塞万提斯是“天主教作家”、“罗马教会的忠诚儿子”。德文版《堂吉珂德》序言，1837年，第51至59页。转引自《塞万提斯思想》，巴塞罗那，1980年版。

荡公子乔装打扮混进了住宅并买通侍女欺骗了主人……

**1606年手稿（年轻的
夫人叫伊萨贝拉）**

……伊萨贝拉流着泪，
半推半就，进了浪荡公
子罗阿依萨的房间……

嫉妒的丈夫德加里萨莱
斯睡得死沉……

伊萨贝拉不再落泪。她
在情人罗阿依萨的怀里
睡得比抹了麻醉药的丈
夫还要香三分呢……

天明时，德加里萨莱斯
发现了一对相依相偎的
情人……

他看到伊萨贝拉依偎在
罗阿依萨怀里酣睡不醒
……

**1613年版本（夫人改称莱昂
诺拉）**

（女管家将太太骗到了浪荡公
子的房间）

（基本同左）

莱昂诺拉……充分显示了自己的
本领，使这个狡猾的骗子无法
战胜她。最后，他仍没有达
到目的，但已疲倦极了，她终
于战胜了他。最后他们俩都沉
沉地睡着了。

……也许是天意吧，德加里萨
莱斯虽然被涂上了那种油膏后
沉沉入睡，却突然醒过来了。

（基本同左）

小说的结局大致相同：嫉妒的丈夫悲愤成疾，一病不起。但临终良心发现，后悔当初太嫉妒、太自私，以致险些毁了别人的青春。他把遗产全都留给伊萨贝拉（莱昂诺拉）并立下遗嘱，想成全这对年轻的情人。但是，他死后，那遗孀成天以泪洗面，并最终到城里最僻静的修道院当了修女。罗阿依萨在绝望中与人发生争执，死于非命（罗亚沙去了美洲）。

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在手稿中，通奸是既成事实且基本上是两厢情愿的；而1613年的版本却对此作了更改。阿美利科认为当时正值反（路德）改革运动高潮，宗教法庭气势汹汹。当时，西班牙大兴文字狱且与罗马教会关系密切，追随路德、埃拉斯谟的改革派受到打击，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如胡安·德梅纳、路易斯·德·莱昂、弗朗西斯科·克维多等，都曾遭到非难甚至身陷囹圄。更有甚者，西班牙当局于1612年颁布了十分严厉的《禁书条例》和《禁书总目》，对大量作品上纲上线。所以，阿美利科认为，塞万提斯对自己的作品作这样的修改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得已而为之。而这恰恰舍去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普遍崇尚的性爱描写，掩盖了塞万提斯的真面目。阿美利科还一再例举《堂吉诃德》以及其他作品的有关或类似情况。他甚至称塞万提斯的“伪善”还在于字面上是一个塞万提斯，字里行间是另一个塞万提斯。论据之一是他嘲讽了堂吉诃德的这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用心良苦巧妙无比地“借堂吉诃德以亵渎上帝”：

“……让阿马迪斯的所作所为一起涌进我的头脑，告诉我从哪儿开始仿效他吧！可我知道他也就是不断祈祷，恳求上帝怜悯。我这儿没有念珠，怎么办呢？”

他很快想出了办法：他看到耷拉着的衬衫下摆，便顺手扯下一条，一连打了十一个结子，其中一个比别的都大。那段时间，他就靠这串代用念珠，千遍万遍地背诵《万福玛利亚》^①。

这段描写在1606年再版时被删去了大半，变成了：

“我知道他干的事多半是念经和祈祷。我也要祈求上帝的保佑。”他于是用栓皮楦子做了一串念珠。

同样，在阿美利科看来，描写市民生活的《训诫小说集》蕴藏着更多“出格的表演”，因为它产生在《堂吉珂德》之前。此外，对于通奸等教会视为有罪的行为，塞万提斯更是态度暧昧。不消说，对所有因性爱而“犯罪”的“羔羊”，塞万提斯从来都手下留情，从宽发落。

阿美利科的上述观点激起了塞学界半个世纪的骚动。最初的反响是令他绝望的一片嘘声。且不说海涅的同胞——如斯皮特尔教授（《论塞万提斯小说》，1931年版）——有多么愤慨，连远在新大陆的阿特金森教授等也大喝倒彩（代表作为《塞万提斯及其〈训诫小说〉》，哈佛1948年版）。过后是比较冷静的商榷和日益深广的探讨。

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这番旷日持久的争鸣无疑为塞学拓宽了视野。

塞学从此百川交汇，变成了浩瀚的海洋。

^① 董燕生译《堂吉珂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精装本。

那么，塞万提斯究竟是不是官方作家？

毋庸讳言，塞万提斯一直被视为“官方作家”和“教权意志的代言人”。这些看法主要依据的是十九世纪欧洲某些经典作家和西班牙学者梅嫩德斯·佩拉约有关观点所从出的塞万提斯同西班牙当局及罗马教会的关系。

1905年，梅嫩德斯·佩拉约引经据典，大作文章，从论证塞万提斯与西班牙当局及宗教法庭的“特殊关系”入手，得出结论，认为塞翁不仅是位“官方作家”，而且所接受、所宣达的也主要是“官方意识”。^①为此，梅嫩德斯·佩拉约钩沉索隐，发现了“特兰托教务会议”^②之后急剧出现的大量反骑士道作品，其中就有：P. 梅希亚的《帝国史》（1545），L. 梅希亚的《闲散论》（1546），A. 德·富恩特斯的《自然哲学》（1547），G. 格拉西安的《道德论》（1548），F. 德·奥维多的《致巴利亚多里德法庭》（1549），M. 卡诺的《神学》（1563），A. 蒙塔诺的《修辞学》（1569），L. 德·格拉内达的《信仰》（1582），M. 德·查依德的《玛格达莱娜》（1588），等等。数目之众、声势之大，均属空前。此后又有措辞更加激烈的《家书》（F. 德·巴尔德斯，1603年）和《圣赫洛尼莫教团史》（J. 德·西贯萨，1605年）等反骑士道、反新教的力作涌现。而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经书检机关审查批准的第一部反骑士小说（《堂吉珂德》第一部于1604年9月26日在巴利亚多里德获准出版）。难怪塞万提斯被贴上了“官

^① 梅嫩德斯·佩拉约《美学思想史》，1905年版；《塞万提斯文化》，1905年版。

^② 于1545年在意大利特兰托召开，由罗马教皇亲自主持。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制裁新教徒及新教传播者的方针措施。西班牙作为主要天主教国家参加会议。

方作家”的标签。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发而不可收的骑士小说还照样悄悄地出，悄悄地流传，而且其数量决不逊色于反骑士作品。问题是，一种是官方的、公开的、名正言顺的，而另一种则逐步成了隐蔽的、地下的、回光返照的——传播渠道发生故障自不待言，作者、出版商还要冒很大的风险。显然，统治阶级对骑士文学的态度旨在正本清源、扫除异端邪说；何况西班牙早已光复，骑士文学、骑士文化也已过时。对这样一种背时的、甚至贻害无穷的文化现象进行抨击，许又未必就是执行官方或教权意志使然的。

这个问题于是一直困扰着塞学界。

阿美利科为了自圆其说，逐一考证、比较了《训诫小说集》中的篇什。与此同时，他的对手不断地从半道杀将出来，严词声讨他的“伪善”说。E. 莫雷诺·巴埃兹、毛里斯·莫洛等人联起手来，在《塞学荟萃》（伦敦，1973）中对阿美利科求全责备。巴埃兹指责阿美利科不该以几则短篇小说为依据，“全盘否定塞万提斯”顺应时代潮流的创作思想。他认为：一，塞万提斯曾经以上帝及国王陛下的名义远征勒班托，英勇杀敌，身负重伤，以致失去左臂；而后虽不幸被俘，但却依然忠贞不渝，视死如归；二，战后，他多次上书，向国王表忠；三，他的作品体现了他贬抑时弊、报效上帝和国王陛下的坚定信念；《堂吉珂德》执行了“特兰托教务会议”精神；《训诫小说集》，顾名思义，也是以教会和官方意识为取向的。

诸如此类，必然要牵涉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

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者、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也是接受美学赖以生发的必然前提和

主要理由。近四个世纪以来，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对于塞万提斯及其《堂吉珂德》的接受，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塞翁既可“伪装自己”以“掩人耳目”，那么他在《〈堂吉珂德〉序言》里开宗明义，要“把骑士小说那些呼神唤鬼的谎言扫除干净”的宗旨也便不能令人信服。尤其是在今天，当作品的客观效果（含义）远远超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早已成为一种共识^①、一种阅读定势的时候，反思阿美利科的挑战，塞翁的“宗旨”恐怕就更加令人怀疑了。

那么，塞万提斯写《堂吉珂德》究竟所为何来？

现在看来，当然不只是要把骑士小说扫除干净那么简单。

米尔塔·阿吉雷教授于1971年发表的《塞万提斯小说》认为，反对骑士道和骑士文学只是塞万提斯的一个幌子，他真正矛头所向的是这一文化现象得以苟延残喘的西班牙现实。

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塞万提斯的宗教观、政治观同他的创作思想、创作实践矛盾与否的问题。而且，问题是一直客观存在着的。早在1914年和1920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和梅嫩德斯·皮达尔便分别在《关于〈堂吉珂德〉的思考》和《塞万提斯创作拾零》等著述中已经含混地提到了塞万提斯的矛盾。

阿美利科不甘率由旧章，大张旗鼓地对传统塞学提出挑战，精神可嘉且不乏令人叹服的见解。但是，他过分强调塞万提斯的反宗教、反朝廷色彩，又明显矫枉过正；而且他采用的

^① 梅嫩德斯·佩拉约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智者写的比想的更深远”（《小说的起源》，1905）；海涅也认为“智者的笔比智者本人伟大得多”（转引自《塞万提斯与德国浪漫主义》，1965年西班牙文版）；而笔者却以为读者之和远远高于任何一个作家。

战术也常捉襟见肘，有失偏颇。

首先，他提出“伪善”说的主要依据是《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和《堂吉河德》不同版本的区别，却全然没有意识到，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区别又未尝不是正常的、甚至是别具匠心的技术性删改。譬如，《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1613年版本虽然删去了“通奸”这一情节，但却使小说的性爱描写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也可以说是更高的美学价值。因为人物“强奸未遂”后又 被流放到美洲大陆，恰恰步了德加里萨莱斯的后尘，仿佛命定的一般（因为嫉妒的老丈夫年轻时也曾到过美洲，而且少小出门老大还，因此当他娶回莱昂诺拉时，已是个不称职的丈夫）。这或可暗示、象征一种特殊的文化和心理定势。

其次，从塞万提斯的宗教观、政治观和他的创作思想、创作实践的关系看，阿美利科的“伪善”说亦非无懈可击。

虽然，爱情乃至性爱描写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和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他崇尚人文主义、投身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好见证：且不说《训诫小说集》大多是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的“言情小说”，即便是他的不少剧作和牧歌体小说《加拉苔亚》、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也都是以男欢女爱为主线的。《堂吉河德》虽然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但一些人物的爱情与婚变（往往以现实主义的形态出现）讽刺了主人公那荒唐的“骑士之爱”。必须强调，在塞万提斯那里，爱和性并不神秘。恰恰相反，它是自然的。更须强调的是，所有涉及通奸或强奸未遂的人物，都没有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受到“应有”的制裁。

与此同时，塞万提斯在不少作品中抨击、影射了西班牙军界和僧侣阶层的腐败和奢侈。